

勉勵學生以平常心學習創意寫作

▲作為嶺南大學中文系2024-25年度駐校作家，葉兆言早前以「歷史的訴說，當故事來到香港」為題，與學生分享自己對文學的看法和寫作經驗。

嶺南大學供圖

葉兆言：

出個大作家能提升城市的文學地位

▼葉兆言帶新書在廣州花城文學院和年輕讀者交流。



給學生上課，葉兆言其實充滿疑惑：文學和他們有什麼關係？雖然確實有那麼一些人喜歡閱讀。葉兆言有一種強烈的感受：文學的真相很多時候是讓人很尷尬的。

創意文學寫作的課堂，有的學生為了學分來，有的學生為了老師「葉兆言」而來，葉兆言明白，文學並不能幫年輕人找份好工作，創意寫作的課堂不一定能產出好的寫作者。

首堂課，葉兆言便給學生們來了一場大型祛魅的開場白。當著名作家老師出現在講台上，葉兆言認為，學生們需要撇去對「成功」「著名」這些詞語的濾鏡，回到一個寫作者的平常心來學習寫作。

抗拒「靈感說」全力以赴寫作

「寫作和教學也是整理自己的過程。」對於職業作家來說，寫作是一種苦役，需要每日都在桌子前保持書寫這一慣性勞作。葉兆言抗拒「靈感說」，他更相信肌肉記憶般的書寫慣性。

「福克納一生寫了19部長篇，這些著名作家其實留給我一個勞動的形象。」葉兆言曾回憶，如果說祖父葉聖陶和父親葉至誠對他有什麼影響，那就是祖父和父親常年坐在書桌前，一寫就是七八個小時的背影。作為職業作家，寫不出來、寫不下去的狀態是大多數時候。葉兆言對抗的方式簡單且有效：有沒有靈感不重要，就全力以赴地寫。

到2024年初為止，葉兆言出版了5卷短篇小說集、8卷中篇小說集、7本非虛構作品集和14部長篇小說。每日6點多起床，寫作兩三個小時，這是身為寫作者的日常自覺。葉兆言說，這兩年寫着寫着便會有「缺氧」的感覺。因此，日常他的例牌運動是游泳，這是葉兆言在寫作和教學或者外出之餘給自己放空和留白的時刻。

相比南京的室內游泳池，葉兆言喜歡嶺南大學的戶外泳池。他愛仰泳看天。「香港的天空總是出奇地藍，不時有飛機飛過，飛機在香港似乎都飛得很低。」葉兆言也記得1997年赴台灣時從香港轉機，在港停留期間，跟着導遊穿梭在香港黃大仙這樣的景點，認認真真當遊客。「抬頭就看見飛機在房子上飛過去了。」那是屬於葉兆言難忘的香港畫面。

日行一萬步 觀察香港城市景觀

家在南京，那是長江流經的城市；香港駐校兩個多月，在這座被海環繞着的城市，散步擁有更多風景。葉兆言拿出手機看他在朋友圈的日行步數。數據顯示，在港期間，他平均每天步行一萬到一萬二的步數，大概就是每天在學校周邊走上五六公里。「屯門這裏有很多養老院，平日走在附近，很少會看到行人。」有一次，葉兆言走進了富豪邨，這個有十幾棟五六十層樓的社區，卻也只有不多的老年人在樓下閒坐聊天。從散步的圖景來看，葉兆言發現，香港確實也有一種進入了老年社會的感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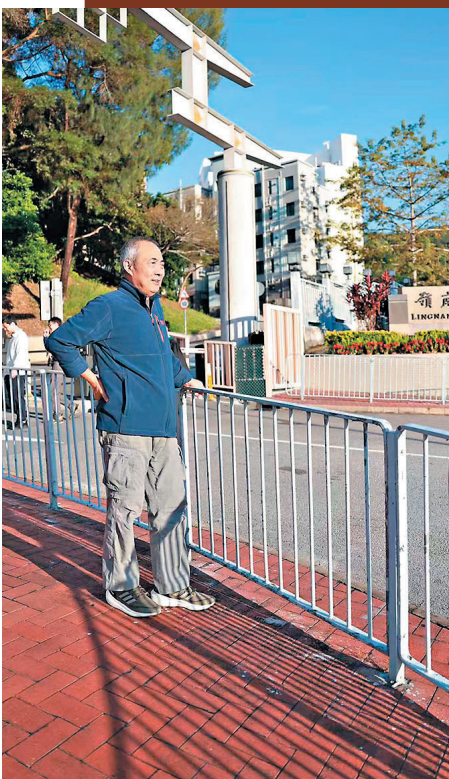
在香港期間，葉兆言和太太也登過一次太平山頂，國際都市的霓虹在腳下流淌似銀河星光。半個多世紀以前葉兆言的祖父葉聖陶在香港，也看過同一片維多利亞的港灣。不過那時白話文運動剛興起，而現在自己的這一代寫作者，面對的則是AI寫作掀起的浪潮。

浪起浪落間，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代表，葉兆言以其持續40餘年的南京書寫，被公認為南京古城的「文學代言人」。他的寫作不僅深度植根於南京的地理空間與歷史脈絡，更以獨特的敘事視角和文學實驗，構建起一座虛實交融的文學南京。

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好奇葉兆言眼中的「文學香港」是何樣式時，葉兆言說，香港不僅是中文作者在書寫，也融合了很多國際寫作者為它持續表達。不過，他也發覺，為香港寫作的作家們也普遍面臨一種困境：在於文化基因的混雜性。在他看來，英治歷史造成的語言斷層，使粵語文學不得不同時面對文言傳統、英語思維和普通話規範的三重壓力。例如，董啟章《天工開物》中的語言實驗，本質上是在尋找粵語書寫的最大公約數。這種努力與王安憶《長恨歌》中提煉滬語精髓的嘗試異曲同工，都試圖在方言土壤中培育出新的文學語種。

談到香港是否要找到屬於它的「文學母題」這一問題時，葉兆言認為，好的作家不應該去做這樣的思考。但他有理由相信，如果香港出現一個好的大作家，一個特別有成就的作家，那麼他或她就相當於能創造出一個新的香港。就像喬伊斯憑藉一部《尤利西斯》將都柏林提升為世界文學地標，使愛爾蘭文學從地方性敘事躍入現代主義前沿。

「我覺得文學的香港要靠作家來創造，當一個優秀的香港作家出現時，自然就會有一個文學香港存在了。」葉兆言繼續用他的寫作平常心來說，要寫香港，並不是說準備好了怎麼樣的配方、弄些什麼樣的調料，去製造出一部特定範式的作品；而是尊重寫作的那種「水到渠成」的狀態，大家要有理由也有耐心去相信和等待，香港一定也會有這樣的文學作品。



●葉兆言常在嶺南大學的山道上散步。

在嶺南大學的山道上，葉兆言會在黃昏時分散步。蟬鳴穿透亞熱帶喬木的闊葉，這位習慣用南京梧桐丈量時間的作家，選擇以腳步校準着屬於他和香港的空間、時間維度。在嶺南大學給香港的學生們講創意文學課，葉兆言有不少疑惑，也直面一些文學真相的尷尬現場。在最後一節課前，葉兆言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的專訪，他透露，已有出版社在邀請他為這段課堂講學經歷寫書，書名暫定為《嶺南十三講》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

胡若璋

●葉兆言早前在廣州花城文學院開展名為「從三流到一流作家」的講座。



「他提醒我們普通人是什麼樣子」

特寫

南京城南的璩家花園，是一座被時間蝕刻的容器。從1950年代留洋教授鳩居藏書樓遺址，到1990年代鹽水鴨攤販在斷壁殘垣旁支起爐灶，這座老宅院以近乎靜默的姿態，承載着三代平民的悲歡離合。葉兆言在2024年秋推出的長篇小說《璩家花園》，用536頁的體量編織出一張綿密的時代之網，將上山下鄉、國企改制、棚戶區改造等重大歷史事件化為人物命運的背景音，讓文學重新回到對「失敗者」的凝視中。

這部小說的主人公璩天井，是被時代列車屢次拋下的鉗工，用遲鈍對抗激變，以木訥消解荒誕。當同齡人追逐出國潮、下海經商時，他固守破敗老宅，等待服刑10年的妻子歸來；在國企改革浪潮中，他成為最早下崗的工人，卻用20年積蓄將老屋改造成「溫暖小巢」。葉兆言坦言：「這個角色對『成功學』的世界沒有任何勵志作用，他只是提醒我們普通人是什麼樣子。」

也恰如小說中反覆出現的天井意象——這個建築中最低窪處，既承接雨水也盛滿陽光，以被動姿態完成對時代的消化。這種生存哲學在細節中閃爍微光。正如評論家所言，這些「螞蟥般的人物」雖被歷史不斷打斷重組，卻在「緩慢、悠長的生命節奏」中保持尊嚴。

「小說中很多痛與苦澀，我無意渲染，只是輕輕撫摸。」葉兆言更多地將筆墨傾注於歷史褶皺中的微觀場景。比如，在「民有向李擇佳求婚需湊足150元買縫紉機」的荒誕裏，在「天井用鋁製煙盒藏避孕套」的窘迫中，時代劇變被解構為具體而微的生存困境。

這種書寫主張，也令很多讀者認為《璩家花園》既不同於《人世間》的史詩氣質，也有別於《繁花》的市井傳奇，更像一部



●葉兆言書寫南京多年，再次推出以「南京」為背景的新作《璩家花園》。

受訪者供圖

用溫柔筆觸擦拭的歷史銅鏡，照見被主流敘事遺忘的生存真相。

「文學從來不是得益者的東西，是失意者需要的東西。」當社會陷入集體焦慮，葉兆言的《璩家花園》提供的不是救贖方案，而是對「失敗」的審美觀照。或許，每一個翻開書的人，總能輕易地在「天井們」笨拙的堅持、「民有」們世故的天真、「李擇佳」們隱忍的深情裏，找到個人對抗時代潮流虛無的錨點。

寫作的時候習慣耳邊有音樂

更早年一些，葉兆言寫作時，習慣耳邊有音樂。

「貝多芬的那種音樂轟隆響，它會給年輕的我一種激勵。」漸漸地，功效退去之後，葉兆言也會在一些美國民謠歌曲裏找異國的情調。他說，當自己想聽鄧麗君的時候，就是希望能有一種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感覺。

「有時候很想聽以前的氛圍。」葉兆言記得父親也喜歡聽鄧麗君，好像她的歌聲一響起，那些流行的語調就自帶有一種衝擊力。不過，寫《璩家花園》時，葉兆言被迫開始戒掉了這個習慣。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搬到了長江邊的新家以後，家裏的音響設備始終沒安裝好。」他說，聽音樂寫作，確實有助於感覺的形成。

說起音樂，葉兆言也勾起了少年往事。「有段時間我經常幫我爸爸倒錄音帶，有時候不小心講話，聲音也很容易被錄進去。」最好玩的事情是，這些錄音帶在主動或被動地對外流傳中，他最後發現，母帶就從自己那流出去，最後又流回來自己手中，錄音帶裏的聲音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嘈雜，還卡帶，最後終成噪音。

當下的生活，旅途成為生活的一個常態。葉兆言自認是個能隨時隨地在飛機、高鐵上寫作的人。飛機引擎的轟鳴、高鐵軌道的咔嚓聲、機場廣播的電子音，這些具有干擾屬性的噪音，在葉兆言的耳朵裏構成了特殊的白噪音矩陣。

「文字有自己的韻律，當環境音足夠單調，反而能聽見標點符號的換氣聲。」他曾在赴法蘭克福書展的航班上寫完三篇隨筆。不過，葉兆言覺得，自己不能算是一個音樂愛好者。在他看來，真正的音樂愛好者是要坐到劇院認真聽音樂會一樣去欣賞。「我其實達不到這種境界，我更多的是需要藉助音樂來為我的寫作懷舊。」



●葉兆言抗拒「靈感說」，他更相信肌肉記憶般的書寫慣性。